



北京宋慶齡故居

北京宋慶齡故居

盛永华

文 物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张广然

封面设计 周小玮

摄影(部分) 何铁生

北京宋庆龄故居

盛永华

文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美通印刷厂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86年10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787×1092 1/32 印张: 1

书号: 7068·1566 定价: 0.38元

宋庆龄——一个熟悉而又有点神秘的名字。人们熟悉她，因为她毕生为祖国的独立、富强，为世界的和平进步而奋斗并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人们又感到她多少有点“神秘”，因为她和她的家庭与中国历史关系之深，使她的一生带上了传奇的色彩。她爱她的父母和兄弟姊妹，但为了真理和正义，她曾长期忍受着与亲属决裂的感情上的痛苦。她曾经是“国母”，最终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全人类……。人们敬仰她，热爱她，渴望了解她。1982年5月，在宋庆龄逝世一周年的时候，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宋庆龄故居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向国内外游人开放。人们络绎不绝地到这里来凭吊、参观，寻找宋庆龄如何从一个爱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国际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答案。

北京宋庆龄故居坐落在幽静的后海北沿。这里碧水蓝天，绿树掩映。一道古老的灰色砖围墙，划出了一座不大的庭园。庭园内花木扶疏，这里便是宋庆龄故居的所在。南围墙有两个大门。东边的红漆大门现在是故居的正门，大门正上方乌亮的楠木匾上，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故居”几个大字，庄严肃穆。如果从以往宋庆龄进出的西边的门进去，沿假山前的小径，可以直达宋庆龄生前的起居之所。这是一幢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假若驱车驶进，假山后的车道直通楼房西门。这里原是前清时代醇亲王府花园的一部分。园中原有厅房亭台、



坐落在后海北沿的北京宋庆龄故居。

小湖假山、曲径长廊……然而随着日月流逝，花园早已荒芜。新中国成立以后，宋庆龄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等职务。因为她在北京原来的住宅交通不便，也不安静，党和政府计划另外为她修建一所住宅，但宋庆龄一再婉言谢绝。1961年2月8日，宋庆龄在给王光美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光美同志……现在国家正在建设时期，在在需款，如另外建造房子，又需费一笔款。为了我个人的住所增加国家的开支，这样将使我感到很不安。故我不打算再迁新址了。你和刘主席在百忙中对我这样亲切的关心，使我十分感激！……”后来周恩来总理亲自选定醇亲王府花园遗址，请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设计，在原来的厅堂的西边，按照原有建筑物的风格，接出一座

两层的小楼。这幢小楼隔着一片湖水，与原有的“南楼”相对，习惯称为“北楼”。宋庆龄从1963年4月搬到这里居住开始，至1981年5月29日逝世为止，在这里工作生活了近二十个年头。



北楼。



南楼。

北楼的下层，一条走廊将房子分隔成南北两边。南边有三个房间，从西至东是小客厅、小餐厅、治疗室。北边也有三个房间，那是秘书的办公室。现在，这里的陈设依然如旧。小客厅里素净典雅的蓝花地毯上，摆着一套沙发。沙发是在山东省定做，由周总理派人送来的。除了一台彩色电视机和一架电唱机外，客厅中并无更多的摆设，只是在门旁的壁橱中，陈列着许多外国朋友赠送的小礼品，如木雕的佛像，竹编的小船，布娃娃等等，这是宋庆龄生前亲手布置的。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曾经在这里和宋庆龄共商国家大事，规划祖国的明天；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首脑，曾经在这里向宋庆龄致以问候，并共同展望人类的未来。在客厅的陈设中，有两张照片格外引人注目。一张是悬挂在东墙正中的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另一张是挂在西墙上的毛泽东主席赠送的大幅生活照片。两张遗像，两位伟人，代表着两个时代，却概括了宋庆龄的一生。他从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开始，最后成为一名共产主义的坚强战士。

宋庆龄是广东文昌县人，1893年1月27日诞生在上海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而那时的中国，却是风雨如磐，危机四伏。腐败的清朝政府一味奉行“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的卖国政策，使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在此同时，一批革命志士为挽救民族危亡，正在秘密进行推翻清朝统治的准备，孙中山是这批革命者中最为杰出的代表。在宋庆龄的孩提时代，孙中山是出入她家的常客。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又名宋嘉树），青年时代曾在美洲做工，在



小客厅。西墙和东墙上分别悬挂着毛泽东主席和孙中山先生的遗像。





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青年时代摄于美国。

美国受教育，学习神学。回国后，他先是在上海当基督教牧师，后来又经营工商业。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孙中山，并受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因而他同情反清革命。他的家，曾经是革命者聚会联络的地点；他开办的印刷所曾经印刷过鼓吹革命的传单；他为决心推翻清政府的“江洋大盗”募集过资金。宋庆龄从小就受到爱国思想和革命思想的熏陶，她崇拜孙中山，并以他作为自己的榜样。

1907年夏天，十四岁的宋庆龄偕妹妹美龄到美国读书，先在新泽西州斯密特城的一所私立学校学习外语。次年夏天，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读书。大学时代的宋庆龄，以她的勤奋好学、聪敏深思、温雅雄辩给老师和同学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她虽然在大洋彼岸，而脉搏却与祖国息息相通。她深情地对同学说：“我

不能忘掉祖国。如果忘掉了自己的祖国，人生是多么没有意义啊！”当她得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败的清王朝的时候，禁不住内心的喜悦，马上在校刊上撰文欢呼“此后四万万人民将无复为专制政体之奴隶，一改四千年来的桎梏，而恢复人类之自由平等。”当她收到父亲从国内寄去的新国旗时，这个一向温文尔雅的姑娘竟然激动得跳上椅子，扯下墙上那面清朝的龙旗踩在脚下，将新国旗挂了起来。

1913年夏天，宋庆龄大学毕业了。她认为留学生毕业后的任务就是为国效劳。她曾在1911年于学校的学生文学杂志上明确地表示过这个观点：“中国目前之诸大问题，亦有待于彼（留学生）等之改革也”，所以她决定回国服务。

1913年，宋庆龄
毕业于美国威斯里安
女子学院文学系。这是
她获学士学位时的
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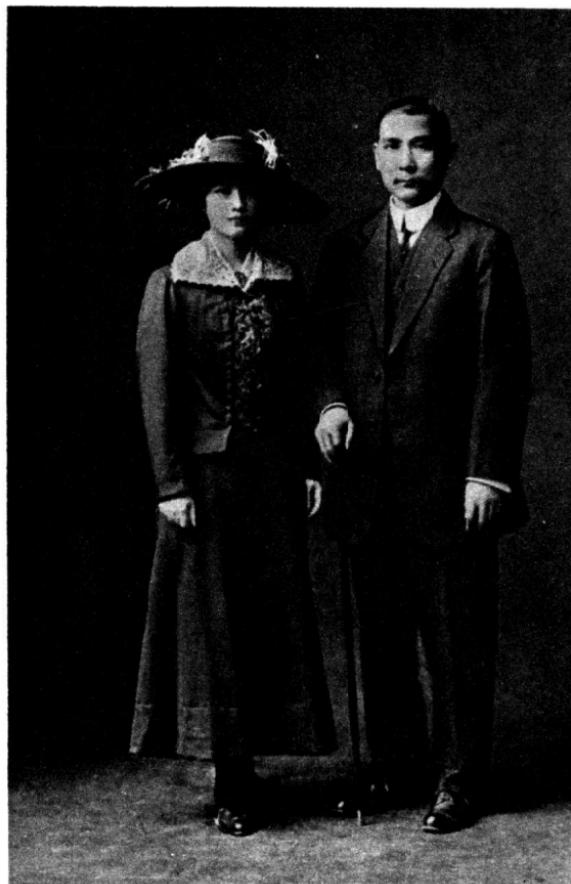
途经日本时，她到东京看望随同孙中山流亡日本的父母。当时，孙中山由于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而走避日本，正在东京重新组织力量，准备发动“三次革命”。孙中山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在宋庆龄纯洁的心灵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她在九月份曾访问孙中山七次，向他了解国内情况，聆听他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加深了对中国革命的认识。1914年春天，由于担任孙中山秘书的宋霭龄（宋庆龄的姐姐）结婚，宋庆龄曾经在一段时间里正式接替她的工作。虽然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事业困难重重，前途未卜，但宋庆龄以巨大的热情投身于孙中山的事业。正是这种爱国热情，使她不顾亲属的反对和责难，毅然于1915年10月与流亡中的孙中山结婚，以此表示对孙中山事业的支持。在孙中山逝世以后许多年，宋庆龄曾经对她的好朋友斯诺谈起过自己与孙中山的婚事：

“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景仰。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出于少女的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只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他当时在东京流亡，我从威斯里安学院回家的途中，曾去看望他，并主动提出要帮助他。不久，他捎信到上海给我，说他需要我去日本。我父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想把我锁在屋里。我从窗户里爬了出来，在女佣的帮助下逃了出来。”

“从我认识孙中山博士的第一天起，到他去世为止，我一直忠实于他，我现在依然忠实于他。”

在与孙中山共同生活的十年中，宋庆龄是孙中山的伴

1915年10月，宋庆龄同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结婚后留影。



侣和战友，她协助孙中山整理文件，处理函电，总结经验。为了进行“反袁”和“护法”，她跟随孙中山奔波于上海、广州之间；为了反对军阀统治，建立国内民主，她率领红十字会员随同孙中山督师北伐，视察炮台、机场……。奔走革命，生活极不安定，但宋庆龄却处之泰然，她知道革命者需要有献身精神。1922年6月，军阀陈炯明在广州发

动叛乱，围攻并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形势极其危急。这时，外表文弱的宋庆龄却表现了勇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她拒绝与孙中山同时撤离，因为这样目标可以小些，行动亦可快些。她急切而坚定地对孙中山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在孙中山离去半小时后，宋庆龄化装成村妇，在两名卫兵和一名副官的保护下，离开炮弹横飞、一片火海的总统府。直至一个月后，才辗转至停泊在广州外海面的永丰舰与孙中山会合。

故居的小餐厅，是宋庆龄日常进膳的地方。在这里，她也曾多次便宴招待班达拉奈克夫人等尊贵的朋友。

治疗室是医务人员给宋庆龄诊病治疗的地方。室内有一张床，两把沙发和两把藤椅。在西墙上，挂着四幅十分醒目的四季花卉刺绣条幅，那是周恩来、邓颖超同志赠送的。宋庆龄象珍视他们之间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战斗情谊一样，珍视这不寻常的礼物。

北楼的上层，如楼下一样，也有一条走廊将房子分成南北两边。南边是宋庆龄的卧室和书房。北边是秘书及工作人员的住所。

走进宋庆龄的卧室，迎面是一张普通的办公桌，桌上放着书报、文件，钢笔和老花眼镜置于公文纸旁，仿佛在这里办公的女主人因为有事刚刚离去。西墙下，放着一张大床，两边的床头柜上，一边用玻璃板压着孙中山“共进大同”的手迹，另一边摆着宋庆龄1927年访问苏联时与加里宁夫人的合影。这是她坚持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见证。



卧室。



卧室内的办公桌。



宋庆龄在莫斯科与苏维埃主席加里宁的夫人（右一）和鲍罗廷夫人合影。

压在卧室床头柜上的孙中山手迹。



1925年孙中山逝世，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将苦难的中国推入内战的深渊。这个时期，对于宋庆龄，对于中国人民和革命事业，都是十分困难的时期。但宋庆龄作为国民党革命派的旗帜，没有在个人的悲痛中沉溺下去，而是奋起继承孙中

宋庆龄发表的《对时局宣言》。

山的事业。那时，国民党的反革命派包围着宋庆龄，企图软化她的意志，迫她就范，但宋庆龄没有退缩。1927年7月“宁汉合流”的前夕，宋庆龄已经洞悉汪精卫要步蒋介石的后尘，发动反革命政变。她在7月14日发表了对时局宣言，即有名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明确宣布：“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表示与背叛革命的国民党决裂。反动政府禁止报刊发表宋庆龄的声明，她不得不通过美国人办的《密勒氏评论报》来刊登。

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失败了，武汉革命政府夭折了。在那个阴云密布的岁月，许多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人士被杀害，或被迫转入“地下”，甚至在宋庆龄的亲属中，也酝酿着行刺她的阴谋。但宋庆龄表示：“我对于革命并没有灰心。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

歧途。现在本党虽然有些党员离开了孙中山手定的中国革命的道路，然而已站在本党旗帜之下的千百万中国人民，仍将遵循这条道路以达到最后的目的。所以抱着这样信念的并不是我一个人。我相信国民党一切忠实的党员一定都会遵循这条革命的道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宋庆龄的政治信念，实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她矢志不移的目标。国共合作时期，宋庆龄与许多共产党人成了亲密的朋友，在武汉的国民政府中，许多共产党人是宋庆龄的同事。当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反人民的内战以后，她更认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她深刻理解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思想，并且将这种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认为“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谁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千千万万的农民获得经济解放，谁就站在反革命阵营那边。”因此，她热情支持工农运动，坚决赞成土地革命。为了实现孙中山访问苏联的未竟的志愿，也为了继续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宋庆龄离开充满血腥气味的武汉，于1927年8月启程访问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就这样，宋庆龄拒绝了各种名利的引诱，摒弃了优厚的物质享受，选择了一条艰辛坎坷的革命道路，而且义无反顾。

在宋庆龄故居的她的卧室里，那不成套的家具和墙上挂的她与工作人员合制的象征吉祥如意的安多利恒花刺绣，以及墙边那架她间或弹奏的斯特劳斯牌钢琴……，都在无声地向人们述说着宋庆龄的高尚品德和情趣。宋庆龄病重的时候，就在这间卧室的床上，听到了接受她为中国